

FROM HISTORY TO REALITY

从历史 走向现实

周文彰哲学文选

Zhou Wenzhang's Selected Papers on Philosophy

南海出版公司





国防大学 2 062 7443 1

从历史 走向现实

周文彰哲学文选



南海出版公司

1995·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EG03/3514

从历史走向现实

周文彰 著

总 编 辑 霍宝珍

责任编辑 张爱国

装帧设计 张光保 刘 莉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海军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4.375印张 347千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 5442 0012 4/B·1

定价:15.00元



作者近照

写在前面：

苦涩酸甜的哲学之旅

大概是7月间，我正全力撰写《特区导论》，导师肖前教授电话中告诉我：我的博士论文《狡黠的心灵》已被选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文库》。

导师喜滋滋的话语使我注意到：《文库》哲学卷收入硕士论文24篇，博士论文15篇。在15篇博士论文中，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向的，共5篇，作者分别为吉林大学的孟宪忠教授、武汉大学的汪信砚教授、我的师兄——人民大学的郭湛、陈志良教授，还有我本人。

我又注意到，《文库》分文学卷、历史学卷、哲学卷、经济学卷、法学暨教育学卷，入选作者共200人，其中，在海南工作的有3人，这就是海南师范学院的杨春时教授、海南省财政厅刘桂苏厅长，再就是我。

说实在的，《文库》编委会去年向我组稿时，并未引起我的重视。现在看来，入选《文库》还是一件值得珍视的事情。入选作者多为当代中国相关学科中青年学者中璀璨星辰之辈，我的名字和他们放在一起，使我多少有点不安之感。

我已经几年不搞哲学课题的研究了，特区的社会实践课题引去了我的全部研究注意力，而且看来在可以想见的几年内，我还不可能回到哲学的殿堂中去。但此前关于哲学的那些思考和探索，曾占据了我青年时期的大部时光；作为那些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除

《狡黠的心灵》之外的那些论文，记录了我艰难习步时的苦涩与公诸于世时的甘甜，印刻着我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兴趣发展变化的轨迹；而且，哲学，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因此，这两年，我一直想把那些论文结集成册，既为自己那个时期的哲学研究作个总结，也为关注那些问题的朋友提供方便。这个愿望，今天才得以了结。

我与哲学结缘，纯属偶然。

我生于苏北农村一个“亦工亦农”、城乡结合的中农家庭，父在上海领工资，母在农村挣工分，家境虽不富裕，但绝对没有像别的孩子为缴几块钱的书杂费而在家招“逼”不出钱的父母打骂、在校遭老师训斥的痛苦。我生性顽皮，人称“小皮王”，10岁左右与一个同村同龄男孩打的一场“恶架”，使我脸上至今还有几条手抓的痕迹。但不知怎的，我学习却异常踏实。然而，我勤奋学习并没有任何理想和目标，绝对不能像现在的孩子那样脱口而出回答“你长大了想干什么？”这样的问题，以致我的哥哥周文彬在我读高中时还频频批评我没有“理想”，要我好好读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而认真琢磨理想问题，可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学会“自我设计”。我基本上属于一个面对现实、随遇而安、遇有机会再说的人，不爱遐想未来。因此，小学时我毫无怨言地打猪草、拾麦穗、放风筝；中学时的节假日我勤勤恳恳地晒稻草、拉秧绳、撒猪粪；“社教工作队”进村后，每天清晨和傍晚爬上搭在树杈上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台”，手持铁皮卷成的喇叭筒，自编自擂自唱各种各样的宣传节目。高中毕业时，母亲对我寄托的最大理想是进公社粮管所或供销社，以便家庭可以买到紧俏的米糠、白糖和肥皂，但大队领导却安排我当了民办教师兼“土记者”，为大队党支部写各种各样的总结、报告和报道，煤油灯常熏得我两只鼻孔像烟囱可以掏出黑灰来。然而，这却使我完成了从写作文到为社会写文章

的过渡。

当民办教师三年，我写了近百篇总结、报告和报道，反映大队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抓好“三麦”田间管理之类。材料送到公社，总是上乘；寄到县广播站，家家户户总能经常听到我的名字和报道；唯独寄到报社的，总如石沉大海，无一见效。但我毫不气馁，坚持报道不止。于是，在全县新闻报道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我成了先进典型，作了题为《必须批判“见报第一”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经验介绍，颇引与会者注目。实际上，我何尝不想见报？只是因为无力创新，总是跟在报纸后面模仿。这期间，我也赶上了“农民学哲学”的热潮，报纸上一组一组的“农民哲学家”的文章。我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5篇哲学著作，可惜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因此，虽也想过写写学哲学的文章，但是写不了。

1973年上半年，在公社开会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大学招生，于是鼓着勇气先向公社文教领导宋必余后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登宽表达了想上大学的愿望，不想他们满口答应。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此时，小平同志“文革”后第一次“复出”，他改掉了前一年的单纯推荐制，采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江苏省招生数与推荐数的比例为1:2，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文革”耽误了我的数理化，我只好报考文科。哥哥从青海发来的“改考理工”的电报，后来看很有价值，可惜迟了。在这场中断了7年之后复又出现的大学招生考试中，辽宁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而我的一篇《家乡新貌》的作文，却引起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招生教师的重视，临时通知我口试英语。我当然读不了成段的英语，跟着主考“鹦鹉学舌”，得了个“模仿能力极强”的评语。于是，上

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当时列为保密专业）在本县的唯一的招生名额出乎意外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然而，一封反映我家庭历史有问题的“人民来信”残酷地剥夺了我几乎到手的读大学机会。等问题查清时，大学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一个月后，我免试成了扬州师范学校英语专业的学生。

唉！假如“改考理工”的电报早来几天，假如《家乡新貌》的作文稍差一点，假如没有“人民来信”，我真想象不出现在我在哪里，干什么。

扬州读书两年，我英语学得异常扎实。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使校园又成了批判的战场。我被选拔参加了学校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宣讲小分队”，专门宣讲批判“林彪在平津战役中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宣讲大获成功。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部队纷纷前来邀请。这一讲注定了我与政治理论的缘分：1975年，毕业时，经班主任、政治教研组长赵延清老师提名，学校留我当政治教师。在“突出政治”的那个年代，政治教师是一个重要而荣耀的职业，我乐此不疲。英语无所谓了：河南一个中学生投河自杀前留下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遗言，如万钧之力，一下子冲垮了中学的英语课。

留校任教3年，前两年教政治经济学，后一年教哲学，都是“现贩现卖”，边学边教。留校不久，全国铺天盖地地掀起了“资产阶级法权”，学开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理论。政治教师成了这些极“左”理论的辅导员和传声筒，舆论的专制和我个人理论知识贫乏，使我对这些理论毫不怀疑，我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印在书上、登在报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

1976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似乎加剧了我们社会的震荡和灾难，也使我头脑中新渐产生了一些怀疑或批判的因子。不准悼念

总理使我无法理解而愤愤不平；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使我起之若惊；说邓小平是“四·五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使我难以置信；顺藤摸瓜式地追查“政治谣言”使我如同置身于白色恐怖，因为经我传播出去的“线”不下8条、10条。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常关起门来偷偷议论那四个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人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文革”以来经不断灌输而在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政治观念和心态开始动摇。“四人帮”的垮台使我欣喜若狂，也使我渐渐感到了政治教师的尴尬：原先起劲宣传过的“理论”现在差不多都要反过来向学生、听众“辅导”了。我常为此暗自羞愧，尽管口头上仍理直气壮。

邓小平同志的再度“复出”，带来了知识的升值和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1977年下半年我频频被邀去给想考大学的青年们辅导政治和语文，而根本没想过自己也应该考一考。我满足于现有的中师的教学岗位和陶醉于在扬州已获得的小名气。倒是当时的朋友、现在的妻子潘慧玲竭力鼓动我报考。她的鼓动加上一些朋友的规劝，使我悟出：让我满足的现有学历和地位在别人看来并不行。于是当机立断，赶在报名结束之前报了名，好在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上面有规定：凡符合报考条件，单位不得阻拦。报什么专业呢？社会上沸沸扬扬，说“文革”几年积压了不少人才，竞争一定异常激烈。我认定：能跟我竞争英语的不会很多。果然，扬州地区组织的初试成绩揭晓，英语我得99分，据说全地区第一，从而顺利进入全省组织的复试。复试自我感觉更好。但招生办个别通知：必须改报专业，原因是我已超过英语专业录取年龄。再报专业，当然就是政治经济学了，这门课我连续讲授过两年。于是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二志愿，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三志愿，有人提醒说，填个差一点学校吧，不要全砸了。我横下一条心：要上，就上名牌大学——第三志愿：

南京大学哲学系。

本来，按我的成绩和志愿，我是应该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可是，此为“文革”后第一次正规招生，招生规矩还没有立起来，南京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把全省的高分考生，尽情要了个够，而不管他（她）报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这样，我便进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时间：1978年3月，年龄：25岁，从而开始了我人生的哲学之旅。

人们常用“命定”或“缘份”解释人生机遇、经历和道路。对此我大概永远不会苟同。我与哲学没有任何“缘份”；我读哲学更不可能是命中注定；我对哲学也非天生爱好。人生是在一系列偶然因素中向前伸展的。我之于哲学，便是如此。

我班第一批同学52人；可能有一半左右并未“志愿”，有人入学便想转系。我毕竟属于“志愿”者，加上我的随遇而安性格，便一头扎进了哲学。除了按时听课，还加码读书，读马恩列斯毛，读康德黑格尔。老师的讲课和课外的研读，首先引导我进入了知识的殿堂，方知我此前对哲学的了解多么浅薄，居然还占据过哲学的讲台。其次渐渐培养起了我的批判的思维头脑，书上印的、报上登的，不再都是无庸置疑的真理了。我开始琢磨问题，设定未来的主攻方向。设定的第一原则是尽可能离政治、离现实远些，为了今后不再尴尬。第二原则是充分利用我的英语特长。新生英语摸底测验，我只错了一点，即把play的现在分词写成了playing，又获99分，老师据此免了我的大学英语课。在1979年南京大学首届学生公共英语竞赛中，我又轻取冠军。接着教务处安排我兼任本科生公共英语课教师，既解学校英语教师紧缺之困，又算是勤工俭学，每课时1元人民币，缓解了我的经济窘境。两个原则的结合，使我选择了西方哲学史——既能远离政治和现实，又可

利用英语之长。这就是您现在看到的我最早的几篇哲学论文都是西方哲学史的缘故。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是我生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然也是我正式发表的哲学处女作。在此之前，我写过几篇短论，现在留有底稿的，一篇叫《真理没有阶级性》，是和同学们争论的产物，稿上注有“1978. 11. 初稿”字样，即入学后8个月写的。“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本来是学术界五、六十年代讨论过的老问题，但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革”的思想专制主义使任何人都不敢重提这场争论。“四人帮”粉碎后，学术界日渐活跃起来，被“文革”耽误、压抑了10多年的学者们如同欧洲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那样精神焕发，扬眉吐气，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几乎所有以前讨论过的问题都又被重新提起，例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否起决定作用”，“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虽说还没有什么理论功底，但都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卷进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宿舍变成了课堂，同学变成了争论对手。每天晚自习后从各个教室回到寝室必要争论一番，常常面红耳赤，争吵声传向窗外、传入走道，如同时下某些大学生宿舍飘出的流行音乐一样热闹。正是这种互不相让的争论使我们的读书有一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味道，思想观点、研究方法逐渐成熟起来。如今那批同学，凡在教学、研究岗位的，都成了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却仍怀念那段岁月。

现在我已不知道《真理没有阶级性》当时为什么没有投寄出去，妻子直到今天还说：“当时你要是听我的话寄出去，肯定可以发表。”现在作为纪念，我把它收入了本书。当时可能是缺乏勇气吧。这可以从我投寄另一篇文章时写给编辑的附信中反映出来。正当“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讨论深入展开之际，有两位学者在

《国内哲学动态》杂志1980年第4期发表文章，说“真理有无阶级性”的命题不能成立，言下之意，学术界讨论了一个不该讨论的问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真理有无阶级性”这个命题无可非议》。我可能寄给了《国内哲学动态》，也可能没有寄出去。我准备的给编辑的附信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常思考一些问题，也常喜欢动笔写点东西，比如，我就写过关于真理没有阶级性的文章，但我仅仅是作为练笔而已，从来不曾有过勇气将它们寄出去。这主要是出于“自知之明”心理的支配。这次算是将勇气鼓到顶点了，才将这篇小文章寄给贵刊。这还是我第一次向刊物发稿呢！我多么希望能“开门大吉”啊！

若不可发表，你们能就本文的毛病，赠一点今后应如何写文章的指导意见，我也将会受到鼓舞。

致以

敬意！

南京大学哲学系七七级学生 周文彰

80. 5. 18

从这封信看，文章似乎寄出去了，但已经誊写清楚的文章的底稿上又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先看对方文章，然后再看它。80. 5. 21”，似有重新修改的计划，但现存的手稿中找不到修改稿。到底寄与未寄，并不重要。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幼稚可笑，至多起一个真实记录我思考轨迹的作用而已。

确定西方哲学史的主攻方向后，我便开始读史搞研究。好在我有时间，因为我没有英语课负担，其他课程学得也较轻松。在我国传统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一直作为“折衷主义”、“阶级调和论”而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我却发现，“中庸”是讲人类行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的，例如，在他看来，过分勇敢是鲁莽，太缺乏勇气为怯懦，两者中间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钱过度是挥霍，过分小气为吝啬，介于二者之间的才是节俭。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不可走极端，而应保持适度状态。于是我认定，亚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的“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与“折衷”、“调和”不能等同。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一文写得很苦，前后历经数月之久，既受理论功底、研究能力的制约，又受身体状况的影响。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正在发育的我，每天几乎在饥饿中度过，饿得面黄肌瘦，没精打睬，偏偏小嘴巴又缺乏适应能力，每当母亲把见不着几个米粒的杂菜稀饭端到面前，我就泪流满面，不肯张口，差点一命归西。高中住校时，每餐二分钱菜汤就饭，学生作《十六字令》云：“汤，几片黄叶漂在上，二分钱，打了半茶缸。”进入大学后，晚自习到9点便饥肠辘辘，熬到十一、二点方肯就寝，次日又早早起床，依旧饥肠辘辘，跑步锻炼，朗读英语，然后才进食堂早餐。天天如此，周而复始。终于1980年6月24日凌晨，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急性穿孔。救护车呼啸着驶进省工人医院，透视、验血、进手术室……术后恰逢暑假，算是休息。9月1日准时返校上课。刀伤未愈，身体虚弱，无法久坐，每天上午1节课，勉强坐上两节。其余学习时间，以床为伴，身上盖条床单，躺着看书，同学笑称我为“睡美人”。中晚两餐，食堂米饭太硬，便以煤油炉煮鸡蛋面条度日。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就开始于此时。写作时，写几行，躺一阵。写成后，戴文麟教授充分肯定。

指点修改，荐给《南京大学学报》蒋广学教授，又经指点修改，最后发表于1981年第3期。我终于开始了发表论文的历史！兴奋，激动，远远甚于我后来出版专著。论文发表后，《新华文摘》1982年第1期转载，接着，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复印发行。开门大吉，我喜不自胜。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做学士学位论文。我选择谢林哲学作为研究课题。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但国内关于他的研究少得可怜，解放前有2—3篇文章，解放后也大致如此。由谢林之子1856—1861年编辑出版的《谢林全集》整整14卷，而译成中文的只有《先验唯心论体系》一本。学术界对谢林的冷落与对康德、黑格尔的热情显出巨大的反差。哲学史研究可以作出成绩的有两类，一是开拓：别人没有研究的你来搞，可以填补空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二是深化：别人已有研究的，你可以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高度去掘进。我决意作第一类研究，我立志未来要作国内谢林研究的专家权威。但我的困难是不懂德文，而国内馆藏的谢林著作只有德文版。我写信给《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梁志学研究员求教。他立即回信：“如果你想在德国哲学方面从事教研工作，我认为现在开始学习德语也为时不晚。如果想写毕业论文，我觉得似乎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第一，把题目选在能看到必要资料的程度或范围，譬如选‘谢林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思想的比较。’（《先验唯心论体系》第二章有足够的材料，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有中译本），‘谢林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比较’（《先验唯心论体系》第四章有足够的材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中译本）；……第三，发挥我们所长，不以占有资料取胜，而以理论分析取胜。”

根据这些很有价值的意见，我开始了读书、搜集资料和研究。论文指导教师为黑格尔哲学专家朱亮教授。论文初稿《谢林辩证

法思想初探》于1981年11月24日完成，整整3万字。梁志学阅后来信肯定我“所作的述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要求我改动一遍，“突出自己的看法，并在文字表达方面多下功夫。”朱亮要求我以论文中的“矛盾学说”部分为主体，适当扩充深化成12000字左右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余待日后再论。根据两位老师的指导，论文于1982年1月10日最后改定，题目是《谢林矛盾学说初探》，11500字。我以此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从而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此文后经梁志学进一步指导，我又修改两次，最后由他推荐，发表在《外国哲学》第4辑，商务印务馆1983年9月出版。

此后我又继续作了一段谢林哲学研究，直到考上博士研究生才中止。发表的论文有：《谢林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译文有：《谢林的自然哲学》、《青年谢林和康德》。198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海教授主编《西方古典哲学名著著要》，知悉我研究谢林，约我撰写《先验唯心论体系》提要。我按约完成，时隔8年，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差不多已成为国内对谢林哲学研究得最多的人。然而，我相信继续搞下去，会有建树。然而，我的研究兴趣发生了变化，这留待下面再说。对我来说，谢林哲学之晦涩难啃，超过康德、黑格尔，因为它基本上是一块新开垦的处女地。

大学毕业，我本该有一个更利于发展的理想去处，我属于公认的“拔尖”学生之列：全校英语冠军，连续3年校级“三好学生”，连续4年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有论文发表者，全班不过三、四。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老师们几乎分别同我谈过留我任教。然而，就在毕业分配前夕，朋友帮忙把我妻子从扬州调到了南京。这令系党总支主要领导大为吃惊，她认为我搞“不正之风”——“不正之风”这个词当时不过刚刚问世。

我挨整了（在这节骨眼上挨整的不是我一个）。别的学生在毕

业去向上可以挑挑拣拣，计较论理，我只有等待发落的份儿。孩子刚刚出生，尚未满月，住在楼梯洞里，妻子整日提心吊胆，伤心流泪。我虽得与该领导关系甚密的其他领导与老师的赏识，但断断不敢请他们说情，怕又是“不正之风”，错上加错。分配结果：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一所刚由中专升格的大学。当晚我借了一部自行车，独自考察我将去工作的单位，校园内转了一圈，两行泪水顺着脸颊凄然而下：这哪里像高等学府？活脱脱的中学模样。“背时凤凰不如鸡”的滋味顿时爬满心头。我是怎么回到南京大学那个正充满欢乐的寝室的，我已全然不知了。我属于分配最差的同学之一。

我的充满风光的大学时代，就这样划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

在南京建工学院（我要特别说明，它后来发展很快，逐渐成了考生争相报考的“热门”学校），我再度走上阔别4年的哲学讲坛。不过较之第一次，情况有了质的变化：以往的听众是中师生，现在的对象则是本科生；以往属“现贩现卖”，现在则是“满腹经纶”，成竹在胸了。教学效果颇佳：两个班100多名工科学生，无一瞌睡或看其他书籍的。演讲，这是我自高中起就自觉培养并逐渐“内行”起来的特长。那时，我任学生干部，全校学生活动均由我们自己组织，经常主持会议和作报告的需要，使我对演讲发生了浓厚的钻研兴趣。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列宁的《论国家》和《青年团的任务》等著名讲演，是我当时最爱读、爱模仿的几个名篇。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列宁那段“苏维埃的伤口在流着鲜血”、“要巩固一个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的声音和神态，常在耳际眼前回荡。当民办教师兼“土记者”时在全县新闻报道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有稿而不用稿，引起一阵阵热烈掌声。在扬州师范学校读书时在全校

集会上的一个独特发言，使全场的嘈杂声嘎然而止，这成了后来选我参加“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宣讲小分队”的由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欢迎77级新生入学的大会上，我代表新生的发言至今在不少老师同学中仍留有深刻印象。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场面越是壮观，我越是能讲得自由自在；越是有人检查听课，我越是能自由发挥。我常对同行说，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不是在备课中，而是在课堂上，是在面对学生眼睛时同他们“对话”“交流”的过程中。

除了上教研室分配给我的哲学课，我还主动举办课外讲座，承担专为教师补习开设的英语课，南京大学教务处又请我去上本科生的公共英语课。此外，就是继续我在大学时期已经开始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前面提及的那些关于谢林的论文、译文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不过，我在这里写的第一篇论文不是谢林，而是《论巴门尼德的“存在”》。

国内传统的观点认为巴氏的“存在”概念是“精神”，巴氏是唯心主义者，云南大学张尚仁教授提出“存在”是个物质抽象，巴氏是唯物主义者，从而引发了关于巴门尼德的讨论。我是赞成张尚仁的观点的，我只是提供了更深入的论证。论文完成后，我想再走借助专家推荐发表的路子。然而，张尚仁推荐后半年过去了也没有结果。于是，我径直投给《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没想到很快接到回信，通知我发表于该刊1984年第1期。

这是我发表的第三篇论文，但却是我在没有人指导、没有人推荐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它标志着经过几年的磨炼，我已经具备了独立选题、写作和研究的能力。从此以后，我便独立地闯荡哲学的“江湖”了。

走到这一步，我追昔抚今，感慨良多。在迄今为止的哲学之旅中，我如同小孩学步，终于能丢掉帮助独立行走了。夫子曰：